

舊關叢書第二十四種

轉

變

第

一

輯

統一出版社出版

轉變第一輯目次

一、引言

二、轉變各履歷與宣言

(一) 張國燾履歷與勸告中國共產黨書

(二) 孔荷寵履歷與告國人書

(三) 林波等三十六人履歷與宣言

(四) 趙聯夫婦履歷與宣言

(五) 余稼生履歷與宣言

(六) 西北青年勞動鐵軍生史懷玉等三百二十七人聯名告西北青年書

(七) 陳樹禮等百人脫離抗大學籍告西北青年書

(八) 趙巨川等十人履歷與宣言

(九) 崔興亞等百八十二人履歷與宣言

(一〇) 蕭克等十九人履歷與宣言

(一一)馬中興等七人履歷與宣言

(一二)李震等二十二履歷與宣言

(一三)儲憲章等六十九履歷與宣言

(一四)吳益周等十一人履歷與宣言

(一五)周成等二十九人履歷與宣言

(一六)淑浦等六縣共產黨員脫黨宣言

(一七)華沛堂等五百七十八人履歷與宣言

(一八)邵一洵等四百六十二人履歷與宣言

(一九)袁國定等六十一人履歷與宣言

(二〇)郭家駒等二十二履歷與宣言

(二一)廖多沂等八人履歷與宣言

(二二)陳榮金等一百七十八人履歷與宣言

(二三)張志賢等五百餘人履歷與宣言

(二四)劉世隆等十一人履歷與宣言

(二五)吳岳俊等九人履歷與宣言

(二六)孫龍亭等三百人履歷與宣言

- (二七) 汪懷仁等三十一人履歷與宣言
(二八) 李國元等五百餘人履歷與宣言
(二九) 瞿松年等二千餘人聯名脫黨宣言
(三〇) 駱炳坤等二十四人履歷與宣言
(三一) 黃贊龍等四十八人履歷與宣言
(三二) 吳廣九沈吟起履歷與宣言
(三三) 徐樹吾等百零一人履歷與宣言
(三四) 許洪章等六十人履歷與宣言
(三五) 古少傑等二十四人履歷與宣言
(三六) 蔣鳳山等百四十五人履歷與宣言
(三七) 楊光智等十八人履歷與宣言
(三八) 文超等三人履歷與宣言
(三九) 邱海金等三百十五人履歷與宣言
(四〇) 江至生等十七人履歷與宣言

宣言

中國共產黨於民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其赴國難宣言，大略略謂：

「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一、孫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的土地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停止出動，担任抗日戰線的職責」。

上述四項之聲明表示，實為中共之新生。中共過去一切罪惡，當可從重洗滌。

府對此，正如慈親於不肖子之悔悟歸家，出以諒解之愛護。而國人之於中共，亦願另眼相看，尤致深厚之期待。

就意坑戰以還，中共表現，頗趨常軌。曩日之堂皇宣言，東之高擲，不特故態復萌，且復變本加厲。此不僅證明中共毫無悔悟誠意，更足了然其蘇俄之陰謀企圖。茲謹就其歷次大謬言之。

中共宣言擁護三民主義，復倡新民主主義，對三民主義，附會曲解，實際違反。民主義；承認取消推翻國民黨政權之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而中共在各地非法暴行，不可勝計；赤化運動，進行尤見積極；官稱取消蘇維埃政府，而變相之各邊區政府，又先後成立；紅軍名義，固已改易，然仍自成系統，擅自擴充，不遵調遣。且復大肆其持久戰游擊戰之宣傳，實則一貫施其游而不擊，不游不擊之故技。而最使吾人引為痛心者，其中共軍隊，槍口不向敵人，轉而兼併國軍；在冀國軍及地方武力之被消滅，在晉國軍之被煽惑聚眾，至若魯蘇豫皖鄂等省之軍事活動，無一不顯示中共之野心，新四軍之叛變，即為罪惡暴露之鐵證。蓋中共久已自食其諾言矣。

共產主義之不適用於中國，為一周知之事實。由中共一手所造成之事實，則為一殘涼滿目之悲慘畫圖。吾人痛定思痛，認中共殘酷破壞，不容再行繼續。當中共之宣言悔悟也，我中央曲予饒容，復期以厚望。不意中共陽奉陰違，陰賊險狠，一如往昔。是中共之欲自絕於國家民族也。倒行逆施，中共惟加速其沒落而矣。

張國燾氏，為中共元老派中健者。於中共歷史及一切措施，知之深切，本多年慘痛之教訓，毅然與中共決絕。張氏之告國人書，認救亡圖存，端賴民族精神之高度振揚，以圖達老馬之體驗，發為良心諍言之主張，中共黨人，亟應深省！

中共藉抗戰機會，出以動人之口號。部青年，因愛國熱情奔放，輒被眩惑。抗戰初

期，中共利用之各救亡團體，頗稱活潑。中共爲廣大號召，進行青年訓練，不遺餘力。自抗大陝公等舉辦後，陝北道上，一時絡繹不絕。無如好景不常，中共之欺騙技倆，終爲事實所粉碎。前此對中共滿懷希望者，漸感失望，而所謂陝北天堂也者，則竟人間地獄。復以政府之寬容，三民主義之感化，領袖精神之召示，中共朦朧之青年，咸相率來歸。各地中共幹部，因感於長期苦痛經驗，轉變者亦日衆。中共黨中之脫黨自首，今確應爲一巨大潮流而不可遏止矣。

本編爲轉變續集，中共在抗戰前即已崩潰至不可收拾，舊有幹部，大多轉變於偉大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抗戰軍興，適爲中共死灰復燃之時機，然中共之命運，早爲歷史所註定，試觀今日中共之轉變潮流，吾人益信中共之沒落當不在遠。而「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正確號召，將普遍深入每一中國人民之腦際，新中國之復興，可拭目以俟之。

編者

二、轉變者履歷與宣言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以前，業呈崩潰之勢，其時該黨份子甚至其中央委員，紛紛宣誓，脫離中共。吾人於當時曾將脫離中共自首人員之履歷及宣言，輯爲「轉變」一冊，以供各芳參考。抗戰初期，國人感於中共之宣傳，以其曾發表其赴國難宣言，宣誓俯仰三民主義

及取消一切非法組織，停止暴行，對之頗表好意。該黨亦有死灰復燃之機。不意自武漢大
守抗戰傳人新階段之後，中共故態復萌，不顧國家民族利益，違法暴行，又接踵而起。中
共黨人，不之深明大義之士，對於該黨之倒行逆施，前延暗探，又復屈服。自抗戰初期至
民國三十年夏季為止，中共之宣言說無者不下萬人，茲復將其履歷與宣言編為轉變編輯，
輸以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入，僅選其中較重要者四十篇，列之於次：

(一) 張國燾履歷與告國人書

張國燾，字特立，江西萍鄉人，現年四十四歲，為共產黨元老派領袖之一。

一、歷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並兼蘇維埃政府主席，及蘇維埃政府主席。
據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氏本多聲稱痛乏教訓，已明確認識共產黨是「窮夫三
義之不適用於中國，必然造成共產連串錯誤，經與中共中央人員商討糾
正，不意乃毅然脫離共產黨，並發表告國人書。張氏宣言發表後，共產黨於一月大
黨人多陸續來歸，茲錄其原文如次：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愈認亡國存亡，惟有舉國一致，精誠無間，抗戰到底，
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其犧牲精神之百倍提
高。本人於國難初起，應應到遠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

表，其深望焉。同即辦陳來漢，發自出關中，其色青蒼，君詳爲商計，期於抗戰建國事業，更作進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討未竟，忽聞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之風聲，並遣作種種調音（如加本人以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抗日團結等不諱之詞）當國難中人政治意見，簡略有所聲明，其要點有四：

（一）本人素與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動搖，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爲國家民族效力。

（二）當此國家民族危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三）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爲全國惟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國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爲更嚴密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張，用真誠態度，與中共中央諸君初步商討，未獲納，今後仍望中共諸同人，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

上之簡略申明，本人自信對於當前政治需要，尙無不合之處，乃近見武漢中共同人

公發函件，對於本人主張與行動，續有詆誹，綜其所述，無非蔑棄真理，偏執己見，甚至不惜虛構事實，顛倒是非，以遂其抹殺政治商討，維護局部利益之私圖。如此，足徵中共負責諸君，對於近代政黨應負應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視，政治道德，亦鮮顧及，此本人深爲惋惜者也。

當此抗戰建國之嚴重關頭，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戰士，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均有放棄過去一切成見，端正其政治趨向之必要。並應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努力完成復興民族之大業。據此觀點，願就本人與中共間政治上分歧之點及因此而引起之爭論，略陳梗概，邦人君子與中共諸君幸垂察焉。

關於中共政治路線之全盤檢討，因範圍過廣，此處暫勿深論；僅就目前整個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戰建國基本觀點。加以考察，本人確切相信中共政策錯誤之發生及其過程，實非偶然，而且這一錯誤過程，直到今日，還未停止。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

中共的政治路線，向來是環繞着一個錯誤軸心而轉動。這個錯誤軸心的構成，可從下列諸點，加以簡略說明：

第一，中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與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散漫的農業爲組成國民經濟的骨幹，純民族工業的比重，頗爲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務，對內是剷除封建餘孽，改革土地關係，完成國家的統一，對外是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經濟特權與政治特權。

取領土主權之完整，與政治上經濟上之完全獨立自主，這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關於這一點，在中山先生與趙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趙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而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小地主及自耕農都佔極大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妨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羣衆都是這一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擁護者。

中國共產黨雖亦見到這些基本問題，而並沒有深切的瞭解；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機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陣容，只有循着蘇聯十月革命的惟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客觀條件，基此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機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裏一致地改正過來。

其次，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其目的原爲反對封建割據，亦係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應當確認其爲進步的革命步驟。中其昧於此義，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系，并強調階級鬥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說，處處以階級利

益犧牲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之基本觀點，在理論與實際方面，均已確證其誤。

第二，以上是說明中共對於國民革命理論的錯誤見解，基於此種見解，於對於中國國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為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為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為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言，就國民黨的組成成分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此種估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繼承中國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曾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尚担负著神聖抗戰建國的責任。即以此大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為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為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復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為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例。尤有進者，蔣先生為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勝藉口某些枝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憾。所以那些認為國民黨具有兩面性，在目前抗戰是革命的，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的謬誤觀點，不僅否認了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

三、其對於中國革命之誤判斷，對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及其領導之國統派見，於其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線的連串錯誤。中共本身組織之缺點與退化，亦隨此錯誤路線而愈益充分暴露出來。

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即爲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省數省首先勝利」，近年來更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組織起了新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冒險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第四、抗戰發動以後，全民族之迫切要求爲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中共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權，停止土地革命，並從中央政權，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維護其小組織的利益，因而減弱了階級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自中共年不可救藥的成見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兩個以上不同政治經濟階級的聯合，此政治團體乃基於其社會基礎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階級利益亦異，「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政黨，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兩者間之利害畢竟是不能調和的，這裏便隱藏着過去歷史重複的根源。吾人察省國的中共宣傳，有所謂「共同領

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綱領」等說話，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並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爲己任之氣魄。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爲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據中共之意見，所謂民族統一戰線，諸凡與其意見相左之抗日份子皆放在統一戰線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謂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皆任其作誤謬宣傳，而陝北邊區則視外人租界封鎖尤嚴，如斯作法，豈以爲人盡可欺耶？竊意中共諸君，如果承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與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統一意志抗戰建國之萬分必要，則應毅然決然放棄這些成見與作法，開誠佈公，與國人相見，亡羊補牢，猶未爲晚。

根據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上，願作下列提議，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慮：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下，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毫無保留地實行三民主義，務必言行合一，不再作與此相違背的宣傳和組織；基此立場，中共同人應自動破除門戶之見，泯滅界限，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在蔣先生領導之下攜手前進！

第二，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國家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第八路軍，奮勇殺敵，深爲國人所贊許，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聯軍」之成見，使八路軍國軍化，如此一

而可增強抗戰建國力量，減少一切不必要之顧慮，一面於彼此嚮化之過程中，互相交換經驗，則今後抗戰抗戰實力，當非淺鮮，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教法不問割據；總之，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在中共所領導之游擊區域，亦應奉命中央，充分發揮其抗戰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點，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謂「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的具體內容。

本人與中共歷史關係甚深，由於近廿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瞭解中共政策之不當，尤其是抗戰發生以來，國家民族危如繫卵，更不願躬觀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猶憶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面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進出陝西，殲滅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域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間由於共產國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之決定，遂使此種爭論漸次減少，終於形成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會合。

本人到洛陽北時，恰是西安事變前十天，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抗日反蔣」之宣傳主張而來，其真實則係軍事陰謀。本人事先並未聞此。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面中共負責諸人自不免有情願衝突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後決定採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於此可見中共公文文件所謂本人當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徹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於危亡，因而暗中與彼時所執行者尚嫌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一政策之執行，仍係深懷戒心，觀舍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許多爭執。故此大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積極行動，生肆攻擊，橫加誣蔑，多方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詭計的宣傳，企圖對國際與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運動對外之統一戰線一切組織中央與地方，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份子，以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對待本人之種

種不濟企圖，原應陳明事實，以正視聽，而竟有自有公論，不足深辨。

總之，本人自革命以來，即與國共合作，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奮論行動，實爲國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爲愛護中共國入，更爲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亦誠被濯所抱之異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之惡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國，庶中國革命大業，迅底於成，此不僅個人之幸，抑全體民族之福也。

(二) 孔荷寵履歷與勸告中國共產黨

聞中共中央委員孔荷寵，因感於共產主義之不適合於中國國情，在民國二十三年即脫黨轉而服膺三民主義，並參加國民革命工作，抗戰後孔氏鑒於中共無悔禍成意，乃於某戰區發表勸告中國共產黨書，語重心長，足爲迷途共產黨人當難棒喝：

荷寵曾一度廁身共黨，經數年之苦鬥，與實際所得經驗，深知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其採取之政策，始終陷人於絕境途途，其行爲之結果，每與動機背道而馳，以是毅然決然，於二十三年與中國共黨自動離離，迨七七事變發生，中共正式宣言一放棄過去之政策，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吾人得見昔日同志之悔悟，不僅數萬同胞復歸一，且在